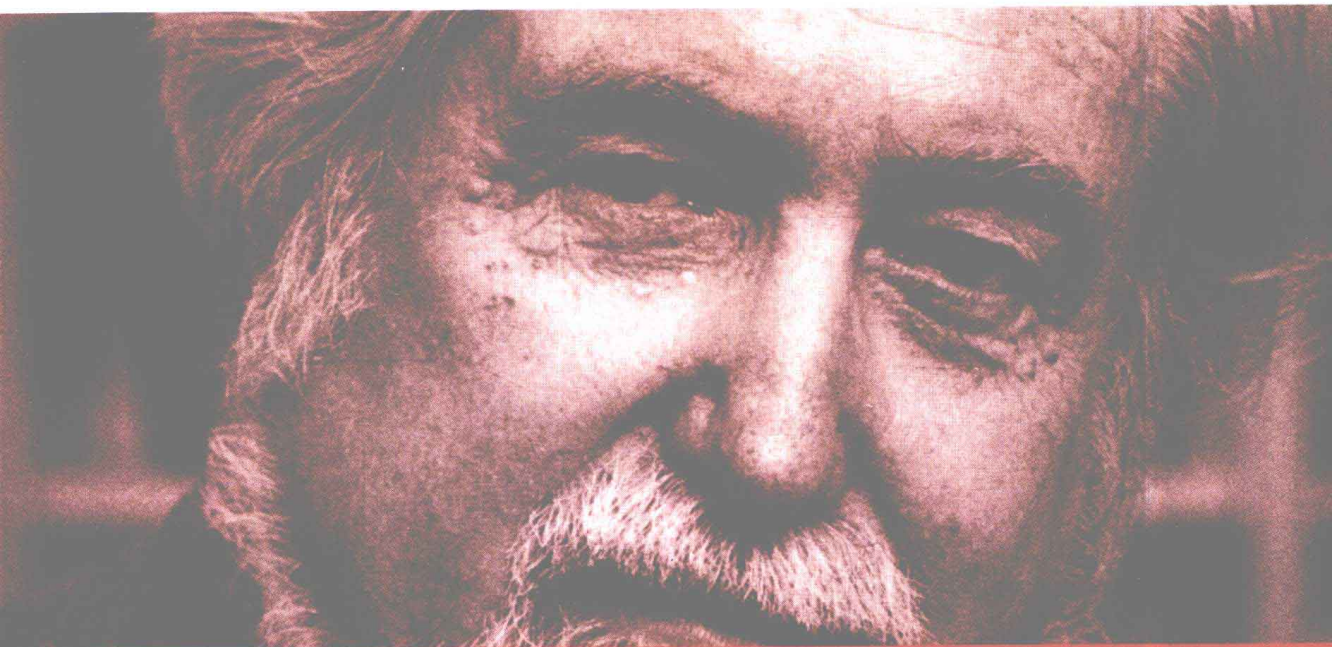


未名传记图书馆

追寻事实

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位人类学家

细阅大师的心灵地图，静听大师的人生感悟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著 林经纬 译

After the Fact

Two Countries,
Four Decades,
One Anthropologi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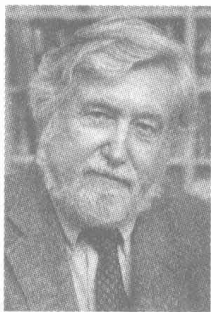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未名传记图书馆

追寻事实

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位人类学家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著 林经纬 译



After the Fact

Two Countries,
Four Decades,
One Anthropologist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0-767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寻事实：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位人类学家 / (美) 克利福德·格尔茨 (Geertz, Clifford) 著；林经纬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1

(未名传记图书馆)

ISBN 978-7-301-19590-1

I. ①追… II. ①格… ②林… III. ①格尔茨, C. (1926 ~ 2006) —评传
IV. ① K837.1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0128 号

After the fact: two countries, four decades, one anthropologist, by Clifford Geertz
Copyright © 1995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e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书 名：追寻事实：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位人类学家

著作责任者：[美] 克利福德·格尔茨 著 林经纬 译

责任编辑：徐文宁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9590-1/C·0708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pw@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12.25 印张 230 千字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总 序

人类学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知识群体。他们在全世界行走，当然更多的是行走在异国他乡，到最偏远的地方居留，能讲当地人的语言，知道怎样融入陌生人群而掏出他们的心里话，获解他们的地方知识。他们把所见所闻、所历所感铺排成篇，挥洒成文，作为一种文化呈现给自己的社会，呈现给心中所勾画的一个互相理解的未来世界。

* * * * *

今天的世界与一百多年前的世界大不相同。此中差别，是人类学家群体参与造成的。因为有人类学家群体的参与，不同人群的心理距离极大地被拉近，地球才在感知上缩小为一个“村”。

今天的我们与我们的太爷爷辈在长相上仍然颇为相似，但在观念的构成上肯定非常不同。今天的我们与地球其他角落的人群在体质上颇为不同，但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却颇有共同之处。此中变化，当然也是人类学家群体参与造成的。

人类学家是现代社会的魔法师，或者说，人类学的知识在现代社会发挥了魔法一般的作用。一个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都十分遥远的世界，被人类学家的专业知识拉得很近。对于异国，对于异族，不仅是中国古人才有山海经式的想象。每个民族自然都曾经是自我中心、唯我独尊的。但是，自从人类学作为一种专业在近百年前形成以来，那么多民族志文本、民族志电影把远方异民族的生活

情景“搬到”各个社会，“呈现”在人们的客厅、书桌、床头，逐渐把一个民族之间充满隔阂、疏远、偏见的世界，微缩为相互颇有了解、分担大量共享文化的人类共同体。尽管人类仍然充满民族问题，但是人类社会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进路上，无疑已经走近第三个阶段。人类的这个历史进步要归功于知识分子群体，其中人类学家群体的贡献最为卓著。恰恰是人类学家掌握着改变人们的异族偏见的魔法。人类学家发挥社会进步的作用，是从创造超越成见、解放异端的知识条件开始的。

人类学家让自己的社会对他人社会感兴趣，无论是借奇风异俗（夸富宴、库拉交换，礼物之豪，斗鸡，割礼）说事，还是从日常生活着眼，归根结底要把他人引入自己的社会，一方面固然是要引导人们发现他人社会的优点，反思自己社会的问题；另一方面却是要让自己的社会学习如何把他人和我群当做同类来思考，并最终能够把人类当做一个整体来思考。人类学是关于人的科学的宏愿，也只有在学界能够把人类当做一个整体来经验性地思考的条件下才是现实。

人类学家与现代世界或者世界的现代性是共生的。传统时代的特征是小共同体内部的同质性和小共同体之间因为差异而对立。世界的现代进程却是给小共同体注入多样性，给差异的共同体增加共同性。在同质性强的社群之内造就文化的丰富选择，在差异、对立的社群之间造就文化共享。

现代社会因为人类学家而不同，因为人类学家的积极参与而更美好。

* * * * *

读人类学家的大作，我们会十分崇拜人类学家的智慧、学识，以及呈现异文化的大德大能。但是，当人类学家的传记把我们带到人类学家的工作现场，带到人类学家的情感世界，人类学家的职业活动和个人生活都一并摆在眼前，我们对人类学家作为学人和作为普通人的紧密联系，以及其中表现出的人的两面性，也就有了某种身临其境的体认。

人类学家在异国他乡的调查现场总是纠结着复杂的情感：临近进入的兴奋与长时间工作形成的焦虑、融入其中的喜悦与作为外来者的孤独、有所得时的

满足与挫折造成的消沉，总是如影随形。人类学家田野作业的情感历程，无一例外是过山车的体验。这是他们个人的经历，这却也是人类不同民族相遇相处的心理的一种表征。人作为个人的内心总是孤独的，但是人能够结成社群过某种社会性的生活。这之中的关键或驱动力是，人对同类感兴趣。人类学家把人类的孤独体验到了极致，也把人类寻找与他人共处的努力发挥到了极致。所以，无论在人性的体验上，还是在解决人性缺陷的不懈努力上，人类学家的经历都最好地诠释了那个时代真正“属人的生活”。

不辱使命的人类学家在智商和情商上都是不同寻常的人，这样一种人一代代地聚成一个特殊的学术群体，构成人类知识生产中一道魅力无限的风光。喜欢把梦想寄托在远方的年轻人，很容易在人生的一个时期迷恋人类学；总在心里为“新异”留一个角落的学人，很容易一生都留意人类学的新成果。人类学是因为人类学家而引人入胜。在知识生产的竞技场上，大多数学科都是在体育场、体育馆里比赛，人类学家却总是跑一个人的马拉松——他们一个人跑得很远，最后才回到体育场接受公众掌声的慰勉。所以，很多人喜欢人类学，然而总是只有少数年轻人会下决心，把自己的求知之志献给并没有跑道的这项特殊的马拉松。惟其如此，人类学总是一个很少数的特殊知识群体所从事的学业。

高丙中

2011年9月25日

目 录

1	城 镇	1
2	国 家	23
3	文 化	47
4	霸 权	71
5	学科规范	109
6	现代性	151

城 镇

假如你在大约四十年间，时常关注两个偏远的城镇，一个位于东南亚某条公路的拐弯处，一个是北非边远居民点和出入口，你不免会想对那里的种种变迁说点什么。你可以对比过去与现在，之前与之后，描述生活曾经如何，而今又是如何。你可以写篇故事，描述一件事的发生是如何导致另一件事，然后又导致其他事：“接着……然后……”你可以设计指标，从中概括出某种趋势：譬如个人主义的滋长、宗教信仰的式微、社会福利的增加、道德风气的败坏等等。你可以写本回忆录，透过现实的缤纷，回顾过去之种种，以求将过往重新体验一番。你可以将过去勾勒成不同的阶段：传统、现代、后现代；封建主义、殖民主义、独立。由此假定一个总揽一切的目标：国家的消亡^[1]和理性主义的“铁笼”^[2]。你可以描述制度的变迁和结构的变动：家庭、市场、公共服务和学校。你甚至可以建立模型，构思过程，提出理论。你也可以用图表来记录这一切。

[1] withered state, 马克思认为，国家衰亡同阶级灭亡紧密联系在一起，阶级灭亡是国家衰亡的前提，从资本主义出发，经由社会主义，最终到达共产主义。——译注

[2] iron cage, 韦伯的“理性铁笼”隐喻是西方韦伯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就像马克思的“异化”、卢卡奇的“物化”或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也是社会理论尤其是现代性问题研究的著名隐喻。理性铁笼预示着现代人的命运，从“宗教—神本位”的理性主义解脱出来的现代人，因为失去了灵魂与心灵的依托，使得整个生活状态处于没有根的“漂浮状态”，职业的分化造就了一批“没有灵魂的专家”，而完全专业化、非人格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运作，使得现代人受到了“为赚钱而赚钱”的经济秩序的奴役，同时还受到科层制普遍化的奴役，人不仅成为只顾赚钱的行尸走肉，也成为组织机器中无生命的螺丝钉。——译注

问题在于，变化比人们一开始想象的还要多，还要支离破碎。两个城镇发生了很多变化，有些是表面的，有些则是深层次的。但是，人类学家自身也在变。人类学家赖以研究的学科规则、学科规则赖以存在的智识框架和伦理基础，同样也在变。两个城镇所在的国家，以及这两个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在变，每个人对于可以从生活中获取什么的认识和体会也在变。这种变化比赫拉克利特^[3]所设想的还要复杂、还要严重。如果从细微直接到宏大抽象，从研究对象到研究对象周围的环境，从研究者到研究者周围的小世界，直至两者所处的更为宽广的世界，一切都在改变，那么，似乎没有任何一处能作为基点，用以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赫拉克利特式的意象其实是虚假的，至少也会比较容易造成误导。时间，这种部分是个人的时间、部分是职业的时间、部分是政治的时间、部分是哲学（不论是什么哲学）的时间，并不像一条大河在向着某个终极的海洋或瀑布奔腾的过程中汇聚所有的支流，而是像众多大大小小的溪流，蜿蜒曲折，时而穿梭，时而汇聚，时而分离。时间也不是或长或短的循环或周期，如同一支叠加而成的复杂声乐，可由某个声乐分析师将其详细解析。这种时间不是单纯的历史或传记，而是多重混乱的历史，大量缤纷的传记。其中或许有某种秩序，但是，这种秩序乃是狂风中的秩序、街市上的秩序，没有任何韵律可言。

因此，我们应当满足于漩涡、汇合和不恒定的连贯性，仿若云聚云散。没有一个总体的故事，也没有一幅纵观全局的画面。或者即便有，也没有人可以像法布里斯在滑铁卢战役^[4]中那样，漫步到故事或画面中去建构它，无论是在

[3] 赫拉克利特（约前 535—前 475 年），古希腊哲学家，主张“万物皆动”、“万物皆流”，认为宇宙万物无时无刻不在永不休止地变化，宣称“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每时每刻，万物都在变化，因此在任一时刻，万物既存在又不存在，总是处在流变中。存在与不存在总是并存于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中。这种对立统一就是世界的本来面貌。——译注

[4] Fabrice，法布里斯是司汤达小说《帕尔马修道院》里的男主人公，糊里糊涂地参加了滑铁卢战役。《帕尔马修道院》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以滑铁卢战役前后二十年为时代背景，通过贵族青年法布里斯内心的情感历程及其与几位异性的感情纠葛，深刻地再现了当时意大利、乃至全欧洲的社会风俗和政治风云，表现了在急风骤雨般的变革时期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的态度和命运。——译注

当时还是事后。我们所能建构的，是关于已发生事情之间相互关系的后见之明，亦即事实之后我们拼凑而成的图案——假如我们持续记录并活得够长的话。

有人想要从我们已知的世界里随机发生的事实中，提炼出各种材料，探寻出某种意义，然而，实际上，哪怕仅仅是对所观察到的事物作一客观叙述，都会带来一连串令人头疼的问题。客观性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拿什么保证确实没有看走眼？所有的科学性都去哪儿了？或许事实就是，一切理解（如果大脑的归纳、周延功能是正确的）都要滞后于实际生活。从诸多单纯的事实中摸索，将其汇聚到一起，拼凑成某种叙述，就形成了所谓的知识，错觉的形成也是同理。某种叙述的形成，都是得益于现成可用的观念和积累而成的文化工具。但是，与任何工具一样，它也需要接受检验。它被赋予了价值，而不是被抽离了价值。即使它宣称具备客观性、正当性和科学性，也不能宣称可以逃避那些证实或证伪其客观性、正当性和科学性的努力。

要描述我的城镇、我的职业、我的世界、我自己的改变，并不需要精心设计好的叙述、测算、回忆或某种结构上的演进，当然也不需要图表，虽然它们与模型和理论论证一样，在设定框架和界定主题上有一定作用。要编织这种叙述，需要展示那些特定的事件和独一无二的历史时刻，此处的冲突和彼处的发展，是如何可以用诸多纷繁的事实，以及一连串的阐释串联在一起，形成关于事情一般如何发展、迄今为止如何发展、将来可能会如何发展的观念。正如弗莱^[5]所说，神话描述的并不是过去发生的事实，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这一论断同样适合于科学领域，包括社会科学在内，所不同的是，科学叙述要求有更牢固的基础和更稳健的思考，有时还要尽最大可能达到不带感情色彩的公正客观之境。



1952年，我第一次来到印度尼西亚的派尔（Pare），它是一个东南亚小镇，位于爪哇中东部布兰达斯河（Brantas，爪哇岛最大的两条河流之一）流域的一个行政区。那时，距离印度尼西亚人民历经五年零星而不懈的斗争，最终迫使

[5] Northrop Frye, 1912—1991, 加拿大著名文化批评家，凭借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在五六十年的西方文论界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三足鼎立。——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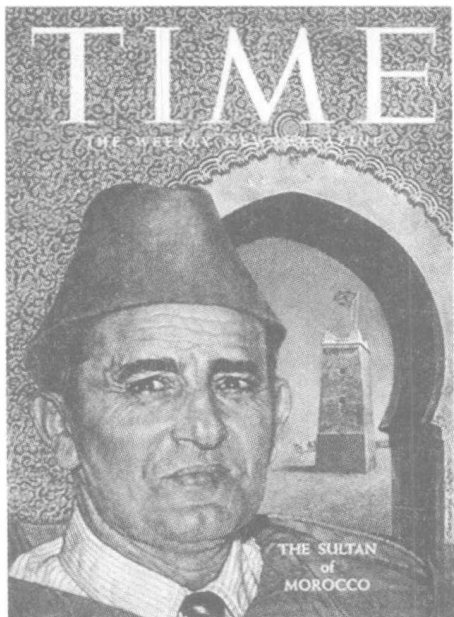
派尔



塞夫鲁

荷兰王国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移交主权，才过了不到两年时间。当时，哈佛大学组建了一个研究生团队，前往印度尼西亚考察这个对美国社会科学界来说还是非常陌生的世界，我是团队成员之一。团队共有十人，包括我当时的妻子。我们从鹿特丹坐船出发，途经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科伦坡和新加坡（这些地名当时都还带有一些浪漫色彩，如今多已失去），历时三个星期，抵达雅加达。我们到达的前一天，那里刚刚发生了这个新生国家历史上首次未遂政变。坦克开到了街头，首都的政治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谣言、希望、破灭的希望，以及对将会出现新的阴谋的想象。

1963年，我怀着进行一种完全不同的集体研究的想法，第一次前往北非摩洛哥的塞夫鲁（Sefrou），它也是一个小镇，位于中阿特拉斯山脉脚下，往南走六十里就是非斯（Fez）。当时我是芝加哥大学的助理教授，此行的目的在于给我的研究生找一个田野调查的落脚点，就像此前我的导师为我所做的那样。当时大约是摩洛哥从宗主国法国那里赢得独立后第六年。极富领袖魅力的英雄国王穆罕默德五世（Muhammad V），突然死于一次微不足道的鼻部手术，他曾被法国流放到马达加斯加，后来回国领导民族独立运动并带领摩洛哥人民赢得解放。他年方三十二岁的儿子哈桑二世（Hassan II），一名军界强硬派人物和爱玩跑车的花花公子，人称摩洛哥的亨利五世^[6]，一夜之间被推上国王宝座。举国上下，突然迸发出一股巨大的悲



《时代》（1957年四月二十二日）封面上的穆罕默德五世，摩洛哥国父、独立之父

^[6] 亨利五世（1387—1422），在登基之前是一个混迹于声色犬马之中的登徒子，但在登上王位后却成为一个贤明的国王，他善于用兵，精于理政，通过阿金库尔战役（1415），夺回对法兰西王位的继承权。——译注

痛，人们任由悲伤肆意宣泄，达到骇人的地步。在首都拉巴特（Rabat）的咖啡馆里，人们到处都在议论着政治（我当时正在伦敦参加一个人类学高级会议，一时冲动就赶到了摩洛哥，恰好就住在拉巴特一带）：质疑老国王的死因，怀疑新国王能否守住权力，猜想谁将会是第一个挑战新国王权威的人。

我仿佛踏入了两出戏之间的中场休息：关键事件总是和我擦肩而过，不是昨天刚刚发生，就是明天即将发生。这让我有一种来得太早、到得太晚的不适感，在我后来的人生中，这种感觉从未离开过我。1952、1958、1963、1964、1966、1969、1971、1972、1976、1986年，无论是在派尔，还是在塞夫鲁，我好像出现得总是不是时候，总是出现在两个良机之间的空当，出现在旧的骚乱刚刚过去、新的骚乱苗头隐约可见的中间。显然，所谓的变革，并非一场可以被冷眼旁观的游行。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派尔^[7]，还是一个破旧、炎热的小镇，小镇十字路口，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泥泞不堪。镇上约有两万人，包括数千名华人。某种意义上，小镇是当地的活动中心，至于它腹地的村落，还有约十万到二十五万村民，具体数字取决于你根据什么去界定腹地。在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正开放式的议会选举过去数年后，甚嚣尘上的政治纷争，席卷了派尔及其周围农村地区。当时的公共政治生活，为四个主要政党所把持，每个政党似乎都铁了心地想要掌握绝对权力，而且看它们的架势，要是法律许可、实际可行的话，每个政党都想

[7] 最早研究派尔的是一个小组项目。与其相关的主要著作包括：A. G. Dewey, *Peasant Marketing in Java* (1962), D. R. Fagg, "Author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A Study in Javanese Bureaucracy" (Ph. D. diss., 1958), C. Geertz, *The Religion of Java* (1960), C. Geertz, *Peddlers and Princes* (1963), C. Geertz, *The Social History of an Indonesian Town* (1965), H. Geertz, *The Javanese Family: A Study of Kinship and Socialization* (1961), R. Jay,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Rural Central Java*, Cultural Report Series, #12 (1963), R. Jay, *Javanese Villagers: Social Relations in Rural Modjokuto* (1969), E. J. Ryan, "The Value System of a Chinese Community in Java," (Ph. D. diss., 1961)。稍后关于派尔的独立研究有 R. I. Wahono, "'Kamar Bola' and 'Waringin':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a Javanese Town and Its Surroundings" (Ph. D. diss., 1984)。最近对包括派尔在内的这一区域的研究有 H. Dick, J. J. Fox, and J. Mackie, eds., *Balanced Development: East Java and the New Order* (1993)。

彻底消灭对手。形势愈演愈烈，最终揭开了一场血腥的政治屠杀的序幕。在这四个政党中，有两个是宗教性的。它们都信奉伊斯兰教，其中一个宣称是革新派、改良派，另一个宣称是传统派、复兴派，两者间的主要差别是在文化上，而不是其他方面。另两个政党，虽然带有一些地方信仰色彩，但至少表面上是世俗化的，极度仇视任何形式的严格的伊斯兰主义。它们一个是民族党 (Nationalist Party)，宣称忠于印尼国父、总统苏加诺激烈而危险的思想；另一个是共产党，它是当时世界上中苏集团以外最大的共产主义政党。



《时代》(1946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封面上的苏加诺，印尼国父

大选于1955年举行^[8]，恰好在我离开一年之后。在我游历了摩洛哥和巴厘岛，于1971年回到当地时，大屠杀已经来了又走，国家政体也已由平民政体变为军事专政。当时的国家政治，由一个半官方性质的、致力于倡导公民宗教的政党控制。表面上，派尔还和过去一样。它的人口流出，与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保持一致，因此，小镇的规模并没有显著增长。还是一样的人民，一样的群体（尽管共产党人已不复存在，苏加诺主义者也明显减少），一样的官僚机构，一切似乎都在照旧运行，人们在权利和财产方面的强烈身份观念，仍然根深蒂固。除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活跃分子主动或被动保持缄默之外，人们的日常生活

[8] 关于这些选举，参见 H. Feith 所著 *The Indonesian Elections of 1955* (1957)，关于合法政党政权的概况，参见 H. Feith 所著 *The Decline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n Indonesia* (1962)。

与以往并没什么不同。在经济生活方面，除了一场“绿色革命”^[9]即将到来，也没有太多变化。所不同的，至少是对我来说所不同的，是心情、情绪、世事经历的色彩。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压抑的地方。

在1955年的大选中，共产党赢得了大约四分之三的城镇选票，伊斯兰复兴派赢得了大约四分之三的乡村选票，苏加诺派和伊斯兰革新派政党，则瓜分了剩余选票的大部分。虽然后两个政党获得的选票绝对数较少，但是，它们在城镇和乡村里那些有影响力的人中要更有影响。事实表明，从力量对比看，选举结果并未像单纯的选票数预示的那样失衡。但是，选举结果仍然有些失衡，并且失衡状态在此后十年间变得日益严重。最后，当各派突然意识到他们的政治游戏赌注有多高，最后的摊牌迫在眉睫时，一切都为时已晚。无论是当初选举的赢家还是输家，都极不情愿地看到：选举结果最终导致兵戎相见的政治格斗。一种挥之不去的“非我即敌”的狂热，笼罩了这个城镇及其周边地区，直到1965年，一场大屠杀最后决定了，谁是自己人，谁是敌人。

早在1958年，这种恐惧和逞强交织的激烈情绪，就已开始在派尔蔓延开来。当时我在巴厘岛工作，正对派尔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那时巴厘岛尚未受此情绪感染，尽管最后这座梦幻岛屿的政治生态，也以复仇和更为血腥的局面告终。总体来说，1955年大选中，这个国家的主要党派之间，还大体保持势均力敌。苏加诺派和伊斯兰革新派，各获得超过五分之一的选票；伊斯兰复兴派和共产党，各获得略少于五分之一的选票。但是，由于始终处于极度激进与极度保守、浪漫民主主义右派和左派之间的两极对立中，始终为残酷的激情所左右，派尔又是非典型的。对于那些热衷于将统计数据的“代表性”作为归纳的唯一基础，以及那些相信宏大结论只能来源于大规模调查的人来说，派尔是个教训，就在此后十年，派尔相当神奇地预告了未来的形势：它成了民族灾难的样板。

大选之后，尤其是1959年之后，当苏加诺宣称无法忍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背叛和多党制等恶魔的围攻（他自己如此夸张地说，

^[9] “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 20世纪60年代起，国际农业发展组织将高产谷物品种和与之配套的施肥、灌溉等技术推广到亚洲、非洲、南美洲的部分地区，促使其粮食增产的一项技术改革活动。——译注

如同但丁在《神曲》^[10]中描述的那样),断然取消宪政民主时,恐怖政治便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降临派尔。非法侵占者涌进先前荷兰人的庄园,政府力图驱逐他们,但却遭到强力抵抗。他们掀翻拖拉机,挥舞着镰刀,慌乱的枪击声不绝于耳。穆斯林青年组织了准军事训练中心,旋即遭到信奉共产主义的青年的攻击。佃农们为土地改革法的漏洞激怒,宣称他们耕种的土地为自己所有,并要求法律上的土地拥有者对此作出回应。伊斯兰革新派被禁,使得信仰虔诚者向右翼倾斜;苏加诺从民族党抽身而出,使得世俗主义者向左翼倾斜。群众集会变得司空见惯,规模越来越大,人们的情绪越来越激进。高喊口号的好战分子举行游行示威,向着政府机关进发。公务员躲在家里不敢出去,宗教学校受到攻击。左翼报纸经销商办公室被捣毁。“外部动乱分子”从四面八方赶来,要求消灭帝国主义撒旦和不承认灵魂的无神论者。武器被发放。名单被列出。信件被广布。

恐慌与不妥协的情绪与日俱增,相互强化,让人们确信失败者将会一败涂地,胜利者则将满盘皆赢。当大屠杀最后降临时^[11],就像占领冬宫和攻占巴士底狱等历史上的著名暴动一样,只不过是一部正在写作中的长篇小说的尾注。假如你身为民族党的当地领导人,得知左派已经锁定你要将你公开行刑,并且计划事成之后占用你那富丽堂皇的别墅作为他们的克里姆林宫;或者假如你是共产党的农会首领,看到城里的墙上到处都贴满了追捕你的公告,公告上你的脑袋被安上犄角,身后被安上尾巴,倒挂在新月旗上,那么,喷薄而出的暴力的到来,将更像是一个结束、一种了结,而不是一个新生事物的开始。一般人所说的大屠杀的残局属性,是一种就义之时近乎宗教仪式般的镇定,有人称之

[10] 引自 D. Legge 所著 *Sukarno: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2) 一书第 4 页。

[11] 对大屠杀最好的概述可能仍是 J. Hughes 所著 *Indonesian Upheaval* (1967)。人们对大屠杀的原因和规模有非常大的争议。Robert Cribb 主编的 *The Indonesian Killings, 1965-66* (Clayton, Australia, 1990) 一书第 12 页,概括了三十九份已出版的估计数字,从近八万到二百万不等。关于派尔所在的东爪哇,参见该书第 63-99 页,尤其是第 83 页;第 169-176 页,尤其是第 173 页。也可参见 Wahono 所著 *Continuity and Change*, 里面有一些关于派尔的定性材料。关于我自己同辈人对此事的反应,参见我所写的文章 *Are the Javanese Mad?* *Encounter* 26 (1966):86-88, 我这篇文章回应了 H. Leuthy 所写的 *Indonesia Confronted*, *Encounter* 25 (1965):80-89, and 26 (1966):75-83, Leuthy 对我的文章的回应刊登在 *Encounter* 26 (1966):88-90。

为认命，有人称之为身心疏离，受害者以这样的心情到他们的迫害者那里就范。这种状态与文化态度和军队权威无关，后两者更像是一种中介，而非原动力，这种状态更能说明以下事实，即十年来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已经使得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现在唯一所剩的事情就是，看看事态的天平会朝哪一方倾斜。

毫无疑问，事态在向右翼倾斜。1965年九月底，总统府卫队在雅加达发动军事政变未遂，这一至今令人费解的混乱而野蛮的事件，被当成一个范本迅速传播，导致一系列类似小规模事件自西而东，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穿过爪哇直到巴厘岛发生。每个地方起初都有持续一到两天的茫然，不知事态将会如何发展。然后，各方通常会在数小时内恍然大悟，明白事情将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而且是朝着一贯的方向发展。紧接着就是杀戮，在军方介入后稍事停顿。每个地方的震荡，一般持续不超过两到三周（我所在的巴厘村落，震荡持续了一宿，三十户人家一夜之间被活活烧死在自己家中），就会遭到镇压，或是自行偃旗息鼓，然后一切又向东重演。大约五个月后，死亡人数总计约二十五万到七十五万。

屠杀在十一月初降临派尔，起因是一位乡村宗教教师（他父亲是名伊斯兰革新派领导人，我曾在1952年与他共事过一段时间），到附近村落（我的同事罗伯特·杰在那里工作）侦查，核实农会中的好战分子正在准备发动攻击的传言是否属实，结果被刺身亡。作为报复，第二天夜间，他的同胞一举烧掉了肇事村落的大部分房子。此后，右翼攻击左翼事件急剧增加，一起接着一一起，一直蔓延到整个区域。我无需像报纸或电视新闻中关于当天暴行的新闻摘要那样逐一综述，且让我引述一位民族党领导人，也就是我之前提及的已被锁定处死和没收房舍的那个人（他于1971年退休，灰心丧气，受够了地方权贵的操控），给我的一份关于“即时场景”的描述。（我省略了脑海里当即浮现的疑问，就是精神病医生难以说出口的“哦，是吗？”及“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1965年不是一个好年头，不仅仅是这里，整个国家都是这样。大部分屠杀都由穆斯林青年团体造成。除了普罗索克拉登（Plosok Klaten，附近一个偏僻的外围村落），那里的共产党人和穆斯林之间发生了小型战